

论“反身而诚”的义商人格

王文华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诚”是最重要的价值标准之一,“反身而诚”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追求和人格倾向。这对中国商人群体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个性特征和精神追求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产生出众多的义商。他们诚信经营、以义行商、爱国济民,把“反身而诚”的人格特性外化为安身立命之本、生财之道和价值追求。在实现“君子”使命,明辨义利和践行“诚”之天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反身而诚”的义商人格。新时代,义商人格在文化自信、价值引领、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义商人格;“反身而诚”;生成逻辑

[作者简介]王文华(1984—),男,湖北蕲春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金融职业学院2023年度校级金院重点科研项目“浙江精神的思想渊源研究——百位浙江籍思想家评介”(项目编号:2023JY05)阶段性成果之一。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08002>

[中图分类号] B222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

一、义商与义商人格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中,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商品的流通,制约了商业的发展,商人的地位和商业的价值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阶级的流动,绝大多数商人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随即买田置地,转身成为地主。“士农工商”等级的划分道明了商人的地位。“无奸不商,无商不奸”不仅仅是一种刻板僵化的偏见,对不参加农耕劳动的蔑视,更是对商业活动及规则的排斥。“奸商”便成为商人的代名词,最早为商人正名的要数司马迁,他的重商思想独树一帜,影响深远。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义商”是“皆非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的人。商人不仅要有精明的头脑,更应该有良好的道德和责任感,二者兼得才能富得长久,正所谓“富好行德,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并强调“仁不能以取予”。因此义商即仁义之商、诚信之商。当然历史上还称之为“良商”“诚贾”“廉贾”等。此处所说的“诚贾”是指诚信不欺的商贾,主要的经营原则是以义行商,诚信不欺。众多的百年老店就是靠着这些经营理念而名扬四海,造福社会。《水窗春呓》中载:“著名老店,如扬州之戴春林,苏州之孙春阳,嘉善之吴鼎盛,京城之王麻子,杭州之张小泉,皆天下所知,……然此各家得名

之始,只循‘诚理’二字为之。”但义商不仅仅只是“诚贾”“良商”,更是指那些在经营活动中遵守儒家的道德准则,具备以义谋利、见义忘利的品质而受到人们推崇的商人。他们把“诚”作为安身、立命、生财之道。真诚待客,信字当先,践行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儒家思想理念和价值观。概而论之,义商是指那些诚信经营、以义行商、爱国济民的商人。

义商在历史的传承和积淀中逐渐形成了特定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个性特征和精神追求,即群体的人格特征,可称为义商人格。义商人格的核心是“诚”,本质在于“反身而诚”。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那么何为“反身而诚”呢?“反身而诚”是指将“诚”的多重内涵要求贯穿到自身的言行举止以及内在精神中,形成时刻反省反思,向内求索的“思诚”状态。《孟子·离娄上》中有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即“反身而诚”(“思诚”)就是把握和体认人之为人和物之为物的基本规律,这样才能进而体认天道。儒家思想中,“诚”是最重要的价值标准之一,“反身而诚”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追求和人格倾向,更是义商们“乐莫大焉”的人生境界和精神自由。在儒家思想浸润下的义商,追逐物质财富,更追求仁义、不朽等

精神财富。因此,“反身而诚”的人格倾向是义商安身立命之本,生财之道和内在价值追求。

二、义商人格的生成逻辑

(一)“君子”使命

儒家思想的精髓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血脉中,现代人虽忘却儒家经典,却在言行举止、思维习惯、价值观上仍无法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宋明理学是儒家思想发展的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既是北宋张载的思想精髓,更成为一代又一代君子们振奋人心的使命。古代中国的商人大部分从读书人中产生,他们大多因科举不中或仕途不顺转而从商,骨子里仍然不弃君子的使命。成为“君子”是其人生追求,亦是安身立命之本。君子的使命是义商们的价值追求,也是义商们摆脱阶层偏见的唯一途径。长期的使命感召下逐渐形成了“反身而诚”的义商人格。何为“反身而诚”?儒家思想认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是个人要取得事功必须要遵循的标准,必须按照这个步骤来进行道德修养和立身治世。只有反身自躬、向内求索、格物致知、明人伦天理,才能实现外在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论述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重大影响。他认为新教教义的核心是“天职观”,其含义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们必须以劳动作为人生的根本目的。二是人们现实的工作都是神意的安排。三是追求财富的积累,以配神恩。加尔文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加了“善功”,认为在上帝面前要成为被救赎的人,除了凭借内心虔诚的信仰以外,还必须要有外在的善功。在现实世界中努力工作、克勤克俭、甘于奉献是成为上帝选民的标准。当然在现世中取得功绩,积累财富,也不是自身的功劳,而是上帝的恩赐,是上帝昭示此人作为选民的资格表现。个人积极工作、勤俭节约、积累财富、造福社会只是为完成上帝交给的使命——成为上帝的选民,只有是上帝的选民才能进入天堂。在这一使命的鞭策下,深受新教思想文化影响的西方国家完成了资本主义的早期积累,由此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西方“天职观”使命与中国传统的“君子”使命有异曲同工之效,都有促使人们形成某种特定的人格特征。西方国家慈善事业的发达,也源于“天职观”的影响,即使积累再多的财富,也不是自身的功劳,而是上帝的恩赐,所以很多的企业家都是慈善

家,把积累的财富大部分捐出来。中国的义商一般没有什么宗教的观念,但在传统儒家修齐治平观念一以贯之的影响下,每个义商心中都有一种推己及人、内圣外王的源动力。即便不能成王成圣,也要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做出努力,以求人生之不朽。如此义商势必“反身而诚”,求仁明理,完成君子使命。长此以往,“反身而诚”的义商人格便产生了。

(二)义利观使然

义利关系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之一,“重义轻利”是传统儒家义利观的核心观点。须指出“重义轻利”并不是舍弃“利”,而是强调“义以为上”“见利思义”。在《论语·里仁》中,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人有生存的正当性需求,这是人的本能,但需通过正当的手段去获取,对于“利”的获得要符合“义”,因此在《论语·泰伯》中,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论语·述而》中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当义利发生冲突时,我们才有所取舍。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荀子·大略》中更是深刻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强调义与利的辩证统一关系,主张重义而不轻利,尚义而不弃利,肯定人们正当合理的利,但是提倡以义取利,利不能损害义。当二者发生冲突矛盾时先义后利、舍利取义,甚至是舍生取义。深受儒家义利观影响的义商早已将这种义利观融入其日常经营之道中,并逐渐形成一种习惯性人格特征。而对义利的正确处理是“反身而诚”,立德求仁的重要体现,是一种君子行为,也是君子使命。

另一方面,义商在民族大义和商德方面为后世做出了表率,直接促成了义商人格的形成。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前往洛邑经商,在滑国遇见将要袭击郑国的秦军。弦高出于爱国,便冒充郑国使者,以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肥牛犒劳秦军,表示郑国已知秦军来袭,并急忙派人回郑国禀告做好防备。秦军误以为郑国防备森严,故退回秦国。安徽休宁《方塘汪氏宗谱·墓志铭》中记载,明朝著名的徽商汪平生,“正德年间,岁大歉饥,蓄储谷粟可乘时射倍利”,而他“不困人于厄,悉贷诸贫,不责其息,远近德之。”《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商业道德》中记载,清朝著名徽商吴鹏翔,寄居汉阳时,“汉阳荐饥(连

年饥荒),鹏翔适运川米数万石至,计之可获利数倍,悉减值平糶,民赖以安。”近代以来爱国济民的义商更是不胜枚举。一战后,上海冠生园的创始人冼冠生,看到外国食品在国内大肆倾销,遂以“提倡国货、改良食品”的方式与外国竞争。天津的实业家宋则久为扩大国货宣传,创办了《白话报》,宣传国货运动;创办了《售品所半月报》,宣传实业救国。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事业成功后,积极支持国内革命活动,热心祖国教育事业,先后创办了小学、中学、大学,涉及师范、水产、航海、农林等各级各类学校,为近代中国教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富好行其德”的义商为商人这一群体做出了表率,他们的大义事迹和商德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商人,这种身体力行的示范效应对义商人格的塑造意义重大。

(三)“诚”的内在要求

“诚”是传统儒家经典里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中庸》对“诚”的阐释最为全面和深刻。《中庸·第二十章》中有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诚”是天道的基本属性和规律,人道应当效仿天道之“诚”,“反身而诚”才能实现人道与天道的贯通,才能实现人生的完满状态。经验上的天道之“诚”则表征为真实、真诚、守正、勿欺等,简而言之包含“诚意”与“诚信”两个方面。“诚意”是“八目”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反身而诚”要达到的地方,只有“诚意”而“正心”才能将格物之理与人的道德修养、齐家治世贯通起来。为履行君子使命的义商不断“反身而诚”,体悟和践行天道之“诚”。而“诚信”为立身处世之本,“诚”是“信”的内在要求,“信”是“诚”的外在表征,“信”还内含自身守信和他人信任之义。如《中庸》所说:“诚于中,形于外。”《孟子·离娄上》从多种社会关系阐释了“诚”的作用,孟子说:“居下位而不获于上,居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可知孟子强调“反身而诚”的重要性。

“诚”作为儒家的核心范畴之一,上至天道规律,下至义商的经营活动,都要求为完成君子使命的义商对内“诚意”修身,践行天道,对外以“诚信”作为行动的准则。“诚意”只能诉诸于内心体验,而“诚信”则可以获得经验性,成为行动准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成为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个人立身之本,也是经营之道。当然,守持

“诚意”,从容淡定,能使人产生精神上的愉悦,践行“诚信”能获得利益上的满足,正如孟子所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三、义商人格的现实意义

义商人格是传统儒家君子人格在商品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变体,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与市场交易规则碰撞的产物,根本上是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的产物。义商人格的精神传承造就了曾辉煌无比的晋商、徽商,造就了近代以来以盛宣怀、张謇、荣德生为代表的一大批救国救民的爱国实业家。义商人格的精神传递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不断延续,焕发生机。互联网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市场经济快速、全面、深入的发展,给义商人格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守正创新。既要坚守“反身而诚”的最基本要求,接续义商人格力量,更要在复杂的世界经济贸易中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新时代,义商人格在文化自信、价值引领、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义商人格的传承和发展,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并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心、自豪感。

第二,有利于增强历史使命感。时代变迁,义商人格的“君子”使命及其精神内核,需要不断的内化和转化才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切合。现代商人在弘扬“反身而诚”的人格精神中实现自身价值,不仅为国家经济发展、民族复兴做出物质性贡献,而且丰富了“历史使命感”的内涵,有利于增强人民大众的历史主动性、创造性精神。

第三,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义商“以诚为本”“以义取利”的精神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义利观、财富观。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开展经济活动,合理合法获取财富。既要肯定财富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又要摆脱“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等“物的依赖”的束缚。既要倡导艰苦奋斗、诚实劳动、诚信经营,保障合法所得,又要鼓励理性消费、适度消费,反对奢侈浪费。

“反身而诚”的义商人格是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形成的,与传统的儒家思想联系紧密,是传统儒

家思想实践的产物。当代人能否在义商人格中汲取营养,取决于对待传统的态度,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应当表述为“以现代性的视角,摒弃传统中不合时宜的元素,汲取合时宜的精神营养为我所用”。因此“反身而诚”的义商人格在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历史使命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等方面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成思.我国历史上的“良贾”“义商”及民族传统商德[J].道德与文明,1995(3):23-24.
- [2] 裴孔亮,唐凯.先秦儒家“义利观”与古代“义商”形象的特质[J].文史博览(理论),2011(1):47-49.
- [3] (战国)孟子,等.四书五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9:35-38,41-43.
- [4] 朱永民,张敏.立品为先:徽商之厚德[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1,34(12):107-108,118.
- [5] 于民雄.浅说“诚”——以先秦儒家经典为例[J].贵州文史丛刊,2008(4):36-39.
- [6] 罗家祥.儒家“诚”“敬”理论的宋代开展及其实践意义[J].哲学研究,2015(5):46-54,128-129.
- [7] 张培高.《中庸》“诚”的多重意义之解析[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9):85-90.
- [8]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

The Personality of Righteous Merchants: Returning to Inner Honesty

WANG Wen-hua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onfucian thought, “sincer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value standards, and “reflecting oneself and being sincere” is a universal value pursuit and personality tendency. This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thinking pattern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piritual pursuits of the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resulting in numerous righteous merchants. They operate with integrity, conduct business with righteousness, love their country and serve the people, externalizing their personality traits of “being honest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livelihood and pursuit of wealth and values. On the basis of realizing the mission of being a “gentleman”, distinguishing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and practicing the heavenly way of “sincerity”, gradually formed the personality of “reflecting oneself and being sincere” in righteousness and commerce. In the new era, the personality of righteous merchants play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cultural confidence, value guidance, and creating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Key words: personality of righteous merchants; “returning to inner honesty”; generating logic